

迈斯纳视阈中的毛泽东与民粹主义

——基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文本分析

沈金霞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从“俄国民粹主义”视角出发,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为文本依托分析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提出毛泽东一生深受民粹主义影响一说,从而强化了哈佛学派的“异端说”,在西方毛泽东学研究领域反响很大。我们围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与莫氏展开批判性对话,认为毛泽东的农民观、城市观和资本主义观坚持和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与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存在质性区别。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5-0022-07

莫里斯·迈斯纳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民粹主义”概念是他研究毛泽东的核心范畴。在《毛泽东主义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论题:城乡关系》《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民粹主义观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斯大林主义》等多篇文章中,迈斯纳反复援引毛泽东1927年2月创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文,并赋予其极高的理论价值和政治地位,认为和毛泽东的早期文本相比,《报告》“民粹主义的倾向更加显著”,第一次突出表现了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区别,“宣告了‘毛泽东主义’的诞生”^①。在迈斯纳看来,把毛泽东和列宁或马克思相比较,把研究视野从西欧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转向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也许能够为分析研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提供一些线索^②。迈斯纳对《报告》文本的这一解读归根到底是一种误读,弱化了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定性和接受唯物辩证方法论的彻底性,未能深刻理解和体悟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信心和决心。

一 迈斯纳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关系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末,一批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致力于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加以比照,详细分析毛泽东、马克思、列宁和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基本主张。作为其中一员,迈斯纳走得更远,甚至错误地认为民粹主义倾向是理解毛泽东思想实质的重要中介,这一观点很快引起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关注。1982年,随着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问世和畅销,美、日等国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民粹主义概念并将其补充到了各自的毛泽东研究中。进入21世纪后,迈斯纳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小册子《毛泽东:一个政治与知识的肖像》中再次强化了这一观点,强调《报告》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是所谓“毛主义”的独特标识。迈斯纳认为,尽管1927

收稿日期:2020-04-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AKS002);南京邮电大学红色校史重点项目(HSXS202001)

作者简介:沈金霞(1975—),女,江苏盐城人,副研究员,博士,江苏农业信息化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专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74页。

②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57页。

年以后不久毛泽东就意识到了列宁的组织原则的有效性,但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冲动之间的冲突成了“毛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报告》在中国革命由谁领导,谁是主要依靠力量以及革命方式、前途、落脚点等问题上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明显差异,具有鲜明的俄国民粹主义倾向,是毛泽东形成革命政治思维的分水岭,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因而也标志着“毛主义”的诞生^①。

迈斯纳重视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首先,从时代背景看,包括迈斯纳在内的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扩大了毛泽东研究的问题域,特别是很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解释清楚。比如,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造党组织的反,而马克思主义则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觉悟的化身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关心农民利益,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马克思和列宁则更同情城市工人阶级的解放,等等。迈斯纳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改革和修正”^②,主张要解释清楚毛泽东的思想动机和来源,就必须从其他的思想资源和方法中寻找答案。其次,从学术背景看,迈斯纳继承并强化了美国哈佛学派一贯的“异端说”立场。从20世纪50年代起,哈佛学派已经开始注意到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独特之处,并就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与左右两派学者进行激烈论辩。二战前后,哈佛学派掌门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率先提出,要关注建立在农民运动基础上的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认为它“遵循的是中国的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③。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最早由费正清的弟子史华慈提出。1951年,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早期运动史的考察,史华慈首次提出“毛主义”的概念,认为《报告》“与其说是出自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手,倒不如说是出自一个俄国民粹主义者之手”^④。不过,除了强调毛泽东在革命依靠力量即农民问题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

同外,史华慈并没有对毛泽东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展开论述。哈佛学派的“异端说”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被学者们接受。他们还大胆类比为毛泽东的德性统治与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对教育、道德的崇尚,试图从更遥远的西方思想史中寻找毛泽东的思想的源头。作为哈佛学派的后起之秀,迈斯纳深受史华慈跳出马克思主义视阈研究毛泽东的方法论启发,完全继承了前辈的学术立场,在与新左派论争的过程中,多次撰文论述毛泽东的若干民粹主义倾向,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异端说”。

二 迈斯纳关于《报告》中所谓“民粹主义倾向”的阐述

迈斯纳对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分析首先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的理解。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内含三个基本观点:一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具有进步意义的必经阶段;二是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三是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能为人所理解把握的客观必然性。以此为依据,他强调指出,毛泽东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与俄国民粹主义联系密切,具体到《报告》这篇文本,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 关于如何看待农民问题

迈斯纳指出,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列宁不信任农民的自发性运动,认为其不是革命的充分条件,而且革命的成功离不开知识分子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否则农民的自发性最终必将导致农民被现存秩序所同化^⑤。《报告》则视来自乡间的农民而不是城市的工人为中国革命的真正行动者和动力之源,热情褒扬农民运动的革命威力,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城市工人革命主体地位的强调和对农民革命性的贬抑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共产国际指示抑制中国农民运动

① MAURICE MEISNER. 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 Polity Press, 2013, p.49.

②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③ 沈金霞:《史华慈的“毛主义”及其毛泽东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④ 该文援引自迈斯纳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斯大林主义》一文,见(美)阿里夫·德里克、(美)保罗·希利、(澳)尼克·奈特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同时参见(美)本杰明·I·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史华慈在该书中评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原文为“从整体上看,它与其说是出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如说是出自俄国。我们这里找不到那些贯穿在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对农民阶级独立的革命作用的责难,相反这里不断地暗示农民阶级自身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⑤ MAURICE MEISNER. 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 Polity Press, 2013, pp.48-49.

过激行为的“并不含蓄的批评”^①。迈斯纳在分析《报告》中的“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农民——笔者注)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时^②,将毛泽东强调必须由农民来判定党的革命充分性而不是由党来判定农民的革命行为,看作是列宁语境中党群关系的颠倒。为此,迈斯纳推断:《报告》“用一种迥异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方式表达了对农民群众的信任”^③。他十分赞同史华慈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断言,即《报告》实际上失去了列宁主义的特征,更像是“出自一个俄国民粹主义者之手”^④。迈斯纳进而将其归因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掌握不多、理解也很粗浅,“可能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对农民命运的预测”,并将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追溯到《民众的大联合》时期^⑤。令迈斯纳纳闷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观如此富有特色,显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出的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领导者和革命主体的最高指示相背离,因此无疑会使他遭受共产国际和党的批评,但结果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为此,他认为这或许是由共产国际意识到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移到偏僻农村继续战斗的客观形势所致。

(二)关于如何看待城市问题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与李大钊都是具有强烈反城市倾向的革命家,他们都视城市为保守主义和道德败坏的堡垒。《报告》指出,“当‘农民在乡里造反’的消息传到长沙时,各方面的人……无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⑥迈斯纳由此认为,《报告》贬低了城市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城市革命者容易受到各种腐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政治上趋于保守,其革命性还不如乡村的农民。比如,在谈到农村教育问题

时,《报告》轻视城市教育,希望农村少开一些洋学堂,少用一些洋教材。迈斯纳认为从毛泽东的反城市倾向中能看到中国儒家传统的影子,比如,孔子就相信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乡村生活中能找到智慧与真理。

(三)关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问题

在毛泽东那里,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敌人。迈斯纳认为,《报告》含有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帝国主义的逻辑,“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没有借助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中含有社会主义潜力的观点,而是从‘中国人民’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⑦。值得注意的是,在迈斯纳的分析框架里,“人民”并不是毛泽东所指涉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进步阶级,而是特指农民,因为农民阶级占了中国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而革命立场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和在马克思看来本来应该起主导作用的城市无产阶级只占了总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为了印证上述观点,迈斯纳分析了毛泽东在《报告》中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指出农民运动的自发性吸引了毛泽东,毛泽东“从头到尾,既没有提到资本主义,也没有提到它产生的现代各社会阶级”^⑧。迈斯纳由此分析,毛泽东对城市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表现得越来越不够关心和信任,究其原因主要是毛泽东主观上淡化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以及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的理论预设,更加关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虽然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明显不同,但它却符合中国的革命需要,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使中国革命的胜利刻上了毛泽东主义的特殊印痕。

三 对迈斯纳的批判性评价

青年毛泽东确实受过民粹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自

①阿里夫·德里克,(美)保罗·希利,(澳)尼克·奈特编:《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15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③阿里夫·德里克,(美)保罗·希利,(澳)尼克·奈特编:《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151页。

④本杰明·I·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主义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⑤MAURICE MEISNER. Mao Zedong: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 Polity Press, 2013, p.50.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⑦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44页。

⑧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45页。

从1920年左右转向马克思主义起^①,他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一主导性思想构架和指引之下对自身思想结构的不同要素进行融合、调整和重构,不断扬弃、改造和超越各类西方思潮。随着对非马克思主义因素的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得到了质性升华,民粹主义虽然对其留下了深刻印痕,但也只是起到了短暂的启蒙作用。《报告》热情讴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反映了毛泽东从组织领导城市工人运动转向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这貌似与俄国民粹派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主张一致,但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俄国民粹派,就不难得出结论:尽管《报告》时期的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够成熟,革命经验还不够丰富,但其观点与俄国民粹派存在着明显的质性区别。

(一) 革命对象论

《报告》不以俄国民粹派在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寻求田园牧歌式的“村社”小农社会主义乌托邦为理想,而以基于反帝反封建进而建设现代性文明型社会为指向。毛泽东本人曾指出,中国革命的目标有别于民粹主义,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②。毛泽东明确摒弃民粹主义的小农思维局限,并不认可落后是一种优势,既不主张土地私有,也不盲目崇尚浪漫田园主义,而是强调发展中国工业和现代化大生产对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这一现代思维在《报告》中也有充分体现,比如,湖南各地农会倡导节俭,实施禁买斋果送情,禁放鞭炮、禁做道场等诸多禁令,毛泽东认为这完全是由于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悬殊太大,“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③。《报告》通篇既没有排斥近代资本主义科学文明,也没有赞扬中国的农业文明和封建文化。另外,《报告》的中心话题是农民运动考察情况,毛泽东不惜笔力,给予农民运动现状以生动全面、浓墨重彩、热情洋溢的讲述,完全符合调查报告的一般写法,不提资本主义或资产阶

级也在情理之中。迈斯纳据此轻易推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不感兴趣而且无意借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先进文化技术为新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只能说这纯属是对毛泽东资本主义观的歪曲和误解。

笔者认为,毛泽东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推行殖民统治让中国丧权辱国沦为“东亚病夫”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救亡图存,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框架内,科学判断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并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在毛泽东的视阈里,反封建旨在通过土地革命,根本变革土地所有关系,解决中国现代性自主建构的农民问题;反帝则直接关乎以被动姿态遭遇现代性的主体重塑和重拾民族自尊自信的问题。两者共同指向经由民主主义过渡的现代型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民主主义主要解决由农业、农村、农民建构而成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现代农业社会向以工业和机器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型社会过渡的问题。因此,迈斯纳所谓毛泽东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依赖于现代资本主义物质基础的论断既缺乏《报告》的文本依据,也不符合毛泽东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

(二) 革命道路论

《报告》主张以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来推翻国内外反动统治,这与俄国民粹派害怕革命、拒绝暴力、寄希望于教育农民通过选举走议会道路根本不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经由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吸引毛泽东和五四先进知识分子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在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旗帜鲜明地将工人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强调阶级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列宁认为,强调阶级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与俄国民粹派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俄国民粹派幻想废除一切等级和民族的限制,但他们害怕并放弃了阶级斗争,其设想的通往平等和平的理想世界的方式幼稚可笑、不切实际,所以,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④。

毛泽东一经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后,便立即

^①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参见(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④《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134页。

自觉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①,并逐步学习运用阶级分析法解剖现实社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其自觉运用阶级分析法理性解答谁是共产党人敌友的开端。《报告》则沿着这一理路,基于翔实生动的实地调查,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中国农民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革命态度,“这一点较之于马克思从整体意义上将农民视为整块一块的思想,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路进步与创新”^②。由此《报告》形成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科学结论,坚定了毛泽东到农村领导疾风暴雨的土地革命的道路自信。可以说,《报告》是自觉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的典范,其立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同时在阶级分析方法上又做了独创性的发展。

(三) 革命领导权论

《报告》主张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与俄国民粹派强调绝对自由意志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根本不同。在马克思和列宁看来,农民革命的性质是主要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主义运动,因此农民革命是狭隘的,工人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要试图将农民阶级纳入自己的革命力量中来,使农民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对于农民阶级来说是有益无害的。《报告》清醒地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明显不足,认为没有先进阶级的引领,农民阶级容易被统治阶级利用,无法通过自发革命取得成功。而和农民阶级相比,中国的工人阶级经历过现代大工业,其阶级觉悟更高、革命性更强。因此,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应该站在农民革命力量的前面去领导农民、组织农民。1925年12月,毛泽东便提出党是群众的“向导”,党领导的正确与否关乎革命成败。而《报告》开端便发问:“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笔者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③通读《报告》全篇,毛泽东肯定工人阶级对农民运动加以领导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革

命的党派,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阶级,理应站在农民一边团结他们,争取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并站在运动的前头,组织他们有效开展对敌斗争。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注重党的建设,提高其自身的组织纪律性,以统一指令、统一行动。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党不但不指导农民革命反而害怕农民革命阻碍农民革命的倒退思想和行动“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提议从组织上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改革^④。总之,毛泽东并不相信农民阶级能够在民主革命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胜任领导角色,也没有赋予农民阶级在革命成功后的新中国中的领导地位。他不但没有对党的威信置之不理或将其置于农民之下,而且非常重视党对农民及其革命的领导。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他的辩证思维。迈斯纳在解读《报告》时仅从革命者“都将在他们(农民——笔者注)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⑤便断定,毛泽东对农民的信任“显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出的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和主体的最高指示相背离”。这是迈斯纳对《报告》的低级曲解,既缺乏文本的依据,也有违毛泽东的党建工作实践。

(四) 革命主体论

在革命主体论问题上,迈斯纳存在两个误读。一是认为《报告》具有反城市倾向。笔者以为,虽然《报告》高度评价乡村的贫农运动成效明显大于工人暴动,但当我们把《报告》置于长时段的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史来考察的话就能发现,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具有任何反城市的偏见。一方面,正如毛泽东并非一般地厌恶农村一样,他也没有一般地厌恶城市,他真正拒斥并意欲打倒的是代表落后生产关系、落后制度文化的城乡反动阶级;另一方面,转入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城市或反对城市。革命从农村开始突围还是从城市开始突围,只是哪一种方案对革命更为有效的问题,并不是反对农村或城市的缘由。提出以农村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的构想,是毛泽东审时度势出于“对城市和乡村革命的不同速度和

①1921年初,毛泽东比较了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温和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等当时国内存在的五种社会思潮,认为前四种思潮或主张议会道路,或否定权力,或强调极端自由,都是行不通的,只有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工阶级国家的列宁主义最宜采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②张明:《重思毛泽东工农阶级社会地位思想的逻辑脉络》,《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3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强度在战略上的评价”^①。二是认为《报告》“可能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对农民命运的预测”。笔者以为,《报告》时期的毛泽东不可能不了解马克思、列宁关于农民阶级的基本观点。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一大明确规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明确了组织工人的近期要求。此后几年,共产党都以城市为工作中心。毛泽东作为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参与组织了湖南工人运动,国共合作后又负责过农会工作,不可能不了解马克思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对工农阶级各自革命作用的态度。其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熟读过《共产党宣言》,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农民阶级的下层可能沦为工人阶级而参加到革命中来的观点不可能不了解,其提出的“工农是最亲近的朋友”观点与《共产党宣言》意思一致。笔者以为,在城市中心论盛行党内外之时,毛泽东反而被农民运动所吸引,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由于毛泽东从小生长在农村,对贫苦农民抱有极大的同情;其二是由于他早年受中国古典小说中农民起义的影响较深,对起义领袖一度非常推崇;其三是由于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农运工作,对农民运动比较熟悉;其四是由于城市工人运动日益陷入低潮因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革命动力;其五是他所具有的求是精神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其中最后两个因素最为关键。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学以致用,强调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和客观需要,有目的地去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正如曼海姆所说:“为了实现某种意图而采取行动的人,永远不会问处于过去的某种情境之中的某位令人崇敬的领导者如何进行行动,毋宁说,他会问这位领导者在目前的情境之中将会如何为自己确定取向。这种针对不断重新形成的因素格局重新为自己确定取向的能力,构成了不断寻求行动取向的那种心灵所具有的、基本的实践能力。”^②《报告》观点鲜明、论据详实、文笔洗练,倾注了毛泽东一月有余实地调查和数日挑灯夜战的心血和激情,它不但加深了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力量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其形成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有力回应了党内对各地地方兴未艾的农运的种种批评与压制,而且惊

艳了共产国际,影响了共产国际建立农村政权的观点,使其认识到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总之,《报告》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一次精彩演绎。

《报告》与俄国民粹派上述四个根本性质层面的区别和差异,正是《报告》的马克思主义意蕴所在。可以说,《报告》是毛泽东自从确立新的政治信仰之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分析中国农民问题所取得的初步成效,全文贯穿着唯物论、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理论,展现了毛泽东善于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较高水平,它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且是其革命理论在落后东方国家的灵活性运用和创造性转化。

四 方法论反思

迈斯纳从民粹主义视角分析《报告》在农民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并以此解释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民粹主义动因。这一主观预设明显存在问题,而其中凸显的若干问题仍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方法论反思。

一要从唯物史观出发认识毛泽东晚年思想。迈斯纳主张把“毛主义”当成一个连续不变的整体,意图从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资源中挖掘出其晚年理论与实践的思想渊源,这就容易混淆毛泽东的“错误”与“正确”。这一研究范式无疑是有失偏颇的。今天,重思迈斯纳的毛泽东研究启示我们,既要厘清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毛泽东个人思想、毛泽东晚年思想等概念的边界,又要端正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动态过程出发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具体而言,首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进一步挖掘毛泽东晚年思想和实践的闪光点和合理要素,如批判“天才论”、反对特权、反对等级制度等,研究其对今天社会主义实践的启示作用;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把握毛泽东所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所思考的重大历史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再次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内外因复杂条件出发,以“多元决定论”为方法论基础,认真总结毛泽东晚年探索出现失误的种种缘由,深入思考如何立足当下“把毛泽东同志已

^①尼克·奈特:《毛泽东和农民:一个革命战略形成中的阶级和力量》(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②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①。

二要在多维文本立体语境中还原毛泽东。尽管迈斯纳本人再三强调无意否定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应有位置,但在研究过程中他又过度勾连《报告》与俄国民粹派,过分夸大民粹主义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影响,无视毛泽东本人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态度,甚至抹杀两者的质性区别。因为毛泽东具有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故美国毛泽东研究往往肩负着为政府对华决策服务或解决国内社会问题的责任,他们学术研究的背后通常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这就可能会出现为了特定政治立场或主张而任意剪裁或过度诠释文本的情况,进而直接影响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定位毛泽东的效度。为此,对于西方学者毛泽东研究的某些成果,我们要审慎阅读、仔细甄别、小心求证。避免因局限于毛泽东的个别文本、个别观点而犯以偏概全、以假乱真、妄下结论的错误。而占有详实的文本资源是扎实开展毛泽东研究的第一步。为此,我们要积极拓展文本阅读空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现代化进程史等多维文本立体语境中努力还原本真意义上的毛泽东的思想肖像。

三要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交互融合中动态透视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之钙,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之根。被迈斯纳用俄国民粹主义误读的毛泽东的农民观,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那里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亮丽底色,是透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不可或缺且十分必要的文化宝库。但长期以来,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知识背景,国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毛泽东的影响问题上众说纷纭,“异端说”“发展说”“内容说”“形式说”“结合说”,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究其原因,其一在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博大深邃又变动不居,加上其“合我者用,不合我者去”的文化选择思维方式^②,给考辨带来了极大难度;其二在于国外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还没有形成普遍共识,因而对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关系的解释缺乏有效的参照系;其三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儒、释、道各家对毛泽东的影响或隐或显、时隐时显。面向未来,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透视毛泽东的思想,意义特别重大、任务异常艰巨,需要进行大量细致深入的文化研究和方法论创新。

Mao Zedong and Populism in the Vision of Meisner:

A Text Analysi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Hunan Peasant Movement*

SHEN Jin-xi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60s, the American scholar Maurice Meisn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ssian Populism”, analyzed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text of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Hunan Peasant Move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that Mao Zedong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populism all his life, which strengthened the “heresy theory” of Harvard School and had a great repercussion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Mao Zedong studi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Mao Zedong’s views on peasants, cities and capitalism adhere to and inherit Marxist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and there are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Russian Populism.

Key words: Mao Zedong; Marxism; Populism;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Hunan Peasant Movement*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②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